

# 云南现代史料丛刊

第五辑



.564

2

5

云南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

一九八五年

云南现代史料丛刊

第五辑

---

云南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

(昆明市环城北路)

昆明铁路局印刷厂印刷

一九八五年七月

---

〔内部发行〕

云南省期刊登记证云出字第079号

成本费用：一元

云南现代史料丛刊

第五辑

云



史研究所

# 云南现代史料丛刊

## 第五辑

### 目 录

党领导下的云南抗日救亡歌咏运动

……………李家鼎（1）

回忆抗日战争前期昆明学生

救亡运动的一些情况……………李天柱（28）

昆明抗日救亡运动中的“联大剧团”……………张定华（53）

云南抗战前期的文化、新闻、统战工作片断

（座谈会记要）

……………李天柱、施子健、严达夫（67）

《曙光日报》的创刊和停办……………曹世文（80）

昆华女中的抗日救亡运动

（一九三七至一九四〇年）……………范立华（89）

抗战期间党在大姚中学的革命斗争

……………万国祥、刘杰、史同知、朱人杰（108）

回忆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

第二支队的建立……………龙树德、宋光、杨雷（120）

回忆王旦东同志……………王浩兰、侯碧、周天一（136）

|                   |                   |
|-------------------|-------------------|
| “六六分队”建立的前前后后     | 柴爱国、姜克夫、费跃 (151)  |
| 改编“西革军”第二、四两个团的经过 | 马荣柱 (163)         |
| 金江中学的革命斗争史        | 张乃澄、杨祚、刘朝茂 (172)  |
| 六顺剿匪迎军回忆录         | 雷溅波 (183)         |
| 解放前昆明市税捐稽征处的革命斗争  | 何若萍、祁惠芬、杨宗鉴 (195) |
| 云南民治实进会和民治党史料辑录   | 荆德新辑 (201)        |

# 党领导下的云南抗日救亡歌咏运动

李 家 鼎 （李同生）

群众性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是在党的直接领导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引下产生的。伟大的“12·9”学生运动中，平、津一带以学生为首的爱国青年，常在斗争中高唱救亡歌曲鼓舞斗志，从而在全国广泛开展起来。从上海、广州到昆明，先后组成了群众性的歌咏团，推广抗战歌曲。随即“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枪口对外，齐步前进……”“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等歌声，就在全中国各地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

抗战前夕，歌咏运动实际上成为我党团结教育革命青年，使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的一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群众运动。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各地人民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云南地处抗战后方，交通闭塞，文化落后，国民党当局虽然以抗战后方为名，增捐加税，做点官样文章，对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活动依旧采取压制政策，但蕴藏在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中的抗日热情，一经引发，就将形成不可遏止的抗日烈火。

为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发动群众，在中国共产党云南地方组织的领导下以学生为首的爱国

青年，应用歌咏活动，很快就掀起了广泛的群众抗日救亡运动，不仅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同时通过歌咏活动的组织锻炼，建立和发展了党的秘密外围组织，培养了大批革命骨干，不断壮大了党的后备力量，其中许多人今天都成为各条战线上党的优秀干部；而且使组织群众歌咏活动形成了一套传统方法，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民主运动武装斗争、直到全国解放，都起着激励同志、发动群众、宣传组织群众的积极作用。今天回顾起来，感到这套开展以歌咏形式为主的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方法，不仅在当时国统区的群众工作中表现出她强大的活力，有的经验对于现今开展群众文艺活动，也还有值得参考的地方。

### 运动的组织领导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共云南临时工委通过李建平（陈方）、李剑秋、赵国徽等同志，由革命学生唐登岷、伍兴仁、曹世文、谭惠英、江毓琛等组成秘密的“学生救国联合会”，团结了一批进步学生。抗战暴发后，在学联的基础上，很快就推动组织起公开的“云南学生抗敌后援会”（简称“学抗会”），发动全市学生进行了许多抗日救亡工作，但遭到国民党当局百般压制；6月间由党组织派遣曾在广州组织过歌咏活动的李家鼎（李同生）回昆明，初期通过旧时英语教员王齐兴，利用基督教青年会教唱抗战歌曲；接着地下党也派唐登岷、曹世文与李家鼎商议，通过在昆华民众教育馆任推广部主任的赵国徽同志的关系，在民教馆举办了“民众歌咏团”，由“学抗会”发动全市各大、中学热情抗日的学生和青年工人、店员以及一些中小学音乐教

员参加，运用歌咏活动形式很快就把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推动起来了。

芦沟桥事变前夕受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委员会委派回昆明开展工作的李群杰同志回到昆明后，组织成立了“中共昆明支部”。昆明支部鉴于群众抗日救亡运动急需加强组织领导，以求巩固发展，决定将运动中涌现的革命骨干进一步组织起来建立党的一个秘密的外围组织“云南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抗先”），并指定李家鼎、唐登岷分别担任正副队长。至此，群众抗日救亡工作就以“抗先”为核心，加强了党的领导。

到1938年夏，经中共南方局批准，建立中共云南省工委（简称“滇工委”），统一党的领导。省工委十分重视歌咏工作在群众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作用，1939年在省工委书记马子卿直接领导下，由李家鼎、张锐、董藩组成“歌运工作的党小组”，负责领导这项工作。这个党小组一直坚持到1941年1月皖南事变时。

1938年10月，按省工委决定，“抗先队”同北方来的西南联大内的“民先队”合并，统一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云南地方队部”继续执行党的任务。1939年2月因形势变化，遵照党中央决定，全国撤消“民先队”组织，在云南将“民先队”各分队领导人和革命骨干先后吸收入党，在各学校、工厂、职工团体分别组建了党支部或党小组。从此各单位秘密的和公开的群众抗日救亡工作，便由各党支部直接领导。至于在群众中有影响的歌咏工作，仍经常参加全市性统一活动，继续发挥着她的先锋作用。

## 认真分析形势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

歌咏运动一开始和在“昆明支部”成立时，都认真分析了形势，认为：（一）党中央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促成了国共合作的局面；抗战爆发后，长期受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压榨的云南人民，为求解放，抗日热情空前高涨。（二）云南地方实力派为抵制蒋介石势力的控制，与蒋介石中央的矛盾日愈尖锐；但在我党争取团结下，只有采取抗日姿态以维持其实力地位，因而在没有对它造成直接威胁的情况下，不得不在一定限度上，放宽对人民群众抗日活动的限制。（三）针对这个形势，我们应当充分利用蒋介石、龙云之间存在矛盾的有利时机，大力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四）抗战爆发后，以学生为首的群众歌咏运动迅速发展，乘此可以通过抗战歌曲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同时加强组织领导，发展人民抗日力量，为争取抗战胜利、民族解放、彻底摆脱反动势力压制而斗争。在这样认识的基础上，遵循党的方针政策，团结一切爱国抗日力量，积极投入群众歌咏工作。

## 掌握运动的领导权

民众教育馆本属地方教育厅的事业部门。在“民众歌咏团”成立以前，已由赵国徽同志争取到馆方的支持，本着团结抗战的原则，邀约一位音乐教师黄某来教唱歌。此人不久前还公开反对唱《义勇军进行曲》，在“民众歌咏团”的成立大会上大家请他唱歌，他唱了那只美化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当场受到群众嘲笑讽刺，以后就再也没来了。

国民党方面自始就企图掌握领导权，曾派它的民运科长张友仁来“指导”。因为实权紧紧掌握在赵国徽、李家鼎同志手上，并经常抵制了他的“指导”，所以全盘歌咏运动的领导权始终在我们党的手上。

### 乘势扩大工作阵地

民众歌咏团刚建立时，由“学抗会”发动全市大、中学校一些热情抗日的学生、中小学音乐教员、青年工人、店员参加，同时从上海、日本等地回昆明的音乐专家林志音、王浩兰、王六益也主动来参加教唱工作。一时集中来民教馆参加活动的多达千余人，为此党组织决定以谭惠英、杨润珍、李家瑛等负责，分开组成“妇女歌咏团”，由林志音负责开办了“儿童歌咏团”；同时以“民众歌咏团”为中心，各学校、工厂、相继组织群众歌咏活动，工作阵地随着逐渐扩大起来，其中活动比较突出的有：

缝纫工会歌咏组——由工人党员李伟负责。

昆明纺纱厂歌咏队——由党员李家瑛、队员施佩珍负责。

大道生织布厂歌咏队——由党员施祖植负责。

开智印刷厂歌咏队——由工人崔丕训、秦克中负责。

火柴厂抗生歌咏队——由党员刘革非、江玉芝、李寿贞，队员施佩珍负责。

邮政工会歌咏队——由陈天易、顾义镛负责。

云南大学歌咏队——由党员谭惠英、陈天锡负责。

昆华师范歌咏队——由党员曹世文、施祖植、李天柱负责。

云大附中歌咏队——由党员欧根和江毓琛负责。

昆华女中歌咏队——由党员禄厚芬、周赞淑、窦家静、李寿贞、范立华、张浴兰负责。

昆华工校歌咏队——由党员张锐、董藩和郭竞华负责。

昆华男中歌咏组——由党员朱君毅、张木天负责。

此外由各学校在节假日到近郊农村进行活动。1938年9月28日日机轰炸昆明后，各中学疏散到呈贡、晋宁、昆阳、路南等县，由各学校歌咏队在各县城和农村开展歌咏活动；各校毕业到外地就业或假期回乡的参加过歌咏工作的学生，也在许多县，如晋宁、建水、蒙自、个旧、罗平、昭通、宜良、凤仪、大姚、镇南、楚雄等开展歌咏活动，随之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也就比较广泛地带动起来了。

### 取得“合法”工作地位，扩大宣传范围

由于地方当局只知压榨人民，从来不搞什么新的群众文艺活动，抗战开始后他们叫嚷的一些空话也逐渐为人们所识破，因此凡当局以官办的“各界抗敌后援会”名义举行的一些重大社会抗日集会，也不得不来邀请“民众歌咏团”出席，并把演唱抗日救亡歌曲作为一项主要内容来壮壮声势。比较大的如：1937年冬欢送六十军北上抗日大会；1938年春纪念孙中山逝世举办全市群众植树运动大会；同年七月七日抗战周年纪念大会（并请我们谱写了纪念歌教群众唱）；同年冬欢迎“华侨运输队归国参战”大会；1938年夏欢送五十八军北上抗日大会；同年秋举办慰劳抗日将士募捐运动等。并且在云南广播电台还专门设立歌咏节目，定期组织各歌咏队演播。

类似集会以后还有，我们本着团结抗战的原则，集合群众歌咏队伍参加，使各歌咏队在宣传实践中得到锻炼的机会，从而也使整个歌咏活动取得了在社会上“合法”的工作地位，并通过抗战歌曲把党的抗日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如“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枪口对外，齐步前进，不杀老百姓，不打自己人”等精神唱到广大群众心坎里，深受人们的欢迎。

### 对国民党基层干部宣传教育

群众歌咏运动开展后，1937年冬在昆明的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五分校担任大队长、坚持地下斗争的我党老党员费炳同志和在军士队任队长的朱家璧同志的支持下，在该校教务会议上提出并经批准，辞退了从不来上课的那位姓黄的“音乐家”的教官职务，正式向民众歌咏团聘请李家鼎担任该校音乐教官。在他们两位同志亲自督导下，分别集中两个大队学员共千余人，每周各上课两次，教唱救亡歌曲，时间长达两年。与此同时，国民党省党部先后办了县党部书记、县宣传干部两次学习班，都在群众的要求下到民众歌咏团来聘请李家鼎担任音乐指导。此外应警官学校邀请，也派了民先队员方为策任音乐教员。各校歌咏队还派出人员参加组织街道民众自卫队，担任歌咏指导，教唱救亡歌曲。通过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和“五四”以来的中国革命歌曲，利用讲解歌词内容的机会，宣传了我党抗日救国主张的精神和中国革命历史常识，深受这些爱国的基层干部欢迎，有人就说：这是从来很少听到过的革命道理！

## 把歌咏团体办成一所革命的大学校

**组织起来加强锻炼培养革命骨干**——为使参加歌咏活动的青年接受组织锻炼，并将歌咏运动中涌现的积极分子，培养成为革命的骨干力量，以推动群众抗日救亡运动，“民众歌咏团”一开始，就将参加的人按各学校、工厂单位分别编组。由各组民主推选负责人，凡有关团务方面的日常工作，由赵国徽召集各组负责人共同商议。1937年10月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抗先队”建成后，各组负责人大都是“抗先队员”。以后各个组内的思想教育、学习内容及工作方面的问题，就由“抗先队”统一研究进行领导。对积极参加歌咏活动要求进步能团结群众的积极分子，便由抗先队员用秘密的“读书会”组织起来，针对每个人的具体情况，进一步加强培养教育，帮助他们提高革命的思想觉悟。正是团结了这些“读书会”的力量，回到各单位去开展工作，经过一段实际工作的考验和了解，凡思想进步、作风纯正、拥护党的抗日政策的骨干分子，再分别吸收为“抗先”队员（1938年秋转为“民先队员”）。1939年以后，大批队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云南二次建党后的骨干力量。当时歌咏工作做得比较突出的如：云大附中因有爱国民主人士杨春洲任校长，杨一波任教导主任和革命进步老师楚图南、冯素陶等的支持，在“抗先分队”领导下，每个班都成立了一个歌咏队，都有一个“读书会”。再如昆华女中“抗先”队员较多，高初中十来个班共发展了七、八个“读书会”，成立了占全校三分之一近三百余人的歌咏队。昆华师范亦复如此。

**学习革命理论提高思想觉悟**——这段时期歌咏活动唱的

都是聂耳、冼星海以及其他许多革命作家根据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创作的抗战歌曲和延安寄来的歌曲，也唱了一些“五四”以来的中国革命歌曲。每次唱歌休息中间，由各组按歌曲内容结合时事形势进行座谈讨论，同时还配合布置阅读公开发行的书刊如：《红军长征记》、《西行漫记》、《陕甘宁边区印象记》以及《大众哲学》、《大众政治经济学》、《世界知识》、《读书生活》等。1941年“皖南事变”以前还读过重庆《新华日报》、《解放》、《群众》等报刊。1937年当读到延安批判黄克功罪行时，民众歌咏团全团还集中讨论了如何树立革命恋爱观的认识。象这样的学习在各歌咏队也推广开来，因此许多青年对党的抗日救国政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思想觉悟也逐步有所提高，并能认识到只有实现党的抗日主张，争取抗战胜利达到民族解放，才能找到个人理想的出路。多年受着国民党反动统治，对他们的空洞宣传失掉信心的广大青年，一旦受到革命思想的教育，很自然地填补了思想空虚，激起了革命热情，因而当1939年冬国民党以加入“三青团”可以升腾为诱饵，引诱青年加入该组织时，只有极少数追求个人名利贪图虚荣的人被拉上钩，却遭到绝大多数爱国青年的唾弃。如昆华女中在歌咏队的带动下，曾几次趁全校集会时，对蒋系反动“教官”威逼同学参加三青团给予严厉斥责。正是这样在女中、云大附中、昆师等许多学校，“三青团”摊子很久都搞不起来。这些学校，在以后的历次学生运动中，都成了运动的主要阵地。

**专门举办歌咏干部训练班**——为适应各方面开展歌咏工作的需要，“民众歌咏团”于1938年2月，举办了第一期“歌咏干部训练班”，从本团和各歌咏队选送并有一些中

小学音乐教员共六、七十人参加，为期一个月。班上除学习音乐理论、歌咏指挥等专业课程外，还根据各人工作中的问题，结合一些革命理论，研究组织宣传教育的工作方法。班里的思想工作由“抗先队”负责，还发展了一些“抗先队员”。1939年春第二期训练班是专门为“民先队”培养骨干，由“民先”云南地方队部负责，学习了《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经济学讲话》、《思想方法论》、《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以后直到1940年，每逢寒暑假先后共举办了四期。通过培训的干部在发展群众抗日救亡运动中，都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事实上这些训练班就成为培养革命骨干的组织活动了。

### **针对形势变化及时组织群众斗争**

侵华日军步步深入，国民党军节节败退，蒋介石积极把力量渗入云南。云南地方当局疲于应付，社会动荡不安。为揭露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排斥异己的阴谋，抵制当局对群众抗日活动的压制，在得到群众支持的情况下，尽量通过歌咏工作扩大宣传，以激励人民抗日情绪，鼓舞青年斗志。这几年除“民众歌咏团”经常利用节假日举办歌咏宣传，组织各歌咏队参加各界群众抗日集会，定期在广播台演播抗日歌曲，组织创作新歌和出版歌集等活动外，我们随时针对形势变化，及时组织各种形式的群众斗争。连年先后发动过如下一些重大斗争和宣传活动：

**扩大群众歌咏组织**——当民众歌咏团建立不久，为使抗日救亡运动扩大到全市各学校、工厂和职工团体，1937年纪念“9·18”，在市中心光华体育场（今人民胜利堂

一片地带)举行了以中小學生为主的“万人歌咏大会”。会后各中学、工厂纷纷组织起歌咏队;小学校普遍教唱抗日救亡歌曲。从此全市响遍了抗战歌声,人民抗日情绪大为高涨。

**1938年以纪念“五·九”组织抗议压制学生抗日救亡活动的示威大游行**——歌咏活动开始已半年多时间,各校学生纷纷集中来参加“民众歌咏团”,反动当局借口妨碍学业,责令各学校阻止学生外出参加社会活动。经党决定召开纪念“五·九”群众大会,由“抗先队”统一布置,在各校歌咏队策动下,以纪念“五·九国耻纪念”为由,发动一次抗议示威。是日先由云大附中、昆华师范学校同学分散来到护国门街头,听午炮一响为号集结成队,高举纪念旗帜、顺各中学驻地进发,沿途高呼口号,大唱抗战歌曲。各校同学在歌咏队鼓动下,冲破禁闭的校门加入游行行列。一路集合了各中学四千人,整队冒着濛濛细雨,沿全市主要街道边唱歌边呼团结抗战口号,示威游行,最后在小西门外潘家湾广场召开纪念“五·九”大会。会上各校代表纷纷发表讲话,抗议当局责令各学校压制学生抗日救亡活动,要求准许同学利用课余时间,出外参加群众抗日救亡活动。经过这次抗议示威后,争取到各校爱国的师生员工积极赞同,可以公开出外参加社会抗日活动,打破了反动当局的封锁,唤起了许多青年爱国热情,一些进步骨干也得到深刻的教育。

**纪念“七·七”,歌运声威大振**——“民众歌咏团”集合各单位歌咏队,参加各界群众举行的“七·七”抗战周年大会,会上教唱了由工人李伟、崔丕训和李家鼎谱写的《七七纪念歌》,受到群众赞扬,从而使得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声威大振。

**举办“学生夏令团”**——由“民众歌咏团”与云大附中联合倡议取得教育厅同意，在爱国民主人士云大附中校长杨春洲、教导主任杨一波和李家鼎共同主持下，利用暑假到宜良路南举办了五十余人的“学生夏令团”。除在当地进行多次宣传活动外，还邀请了知名进步教师楚图南、冯素陶讲授时事政治理论，这次活动，美国来华参战的代表麦克迈也来参加。

**“保卫大武汉”火炬大游行**——1938年9月，日寇逼近武汉，国民党军一味败退。为响应我党中央提出发动人民积极保卫武汉的号召，我们组织各歌咏队，团结群众数千人，举行了“保卫大武汉”的火炬大游行，高举大字标语牌，高呼口号，在市区各大广场分头开展了盛大的歌咏、演讲大会，坚定抗战到底的决心。

**抗议日机轰炸昆明**——1938年9月28日，日机九架突然窜到昆明，市区首次遭到残酷轰炸，人民动荡不安。当局借防遭空袭之机，责令各中学疏散外县，妄图分散学生抗日运动。经歌运党小组研究布置，让各校歌咏队乘机到所驻县城及农村去开展工作。在轰炸当日，张锐同志创作了《哭那样》一曲，当即在广大群众中传唱开来，进一步激发了人们抗日复仇的愤怒情绪。

**揭露汪逆叛逃示威火炬大游行**——1938年12月的一天早上，忽然发现大街上当局命各家悬挂“国旗”，忽又叫撤下。经歌咏队青年反映，是汉奸汪精卫逃离重庆，秘密经昆明窜往香港投靠日寇。当晚由“民众歌咏团”组织留在市内的各校学生、工人歌咏队，发动两千多人，举行一次反汪示威火炬游行。游行队伍中青年工人们编了一组活报剧，

由化装的人民武装押戒着几只披上汪精卫等汉奸名字外衣的狗来游行，激起沿途群众对汉奸极大的愤慨，揭露了国民党降敌的阴谋。次日，《云南日报》作了专题报导；事后报社受到反动当局的严厉责斥。

**基层党建，运动深入**——1939年2月，为避免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错误可能产生的损失，中共中央南方局指示省工委，遵照党中央决定撤消“民先队”组织，由各单位按照各自适合的各种青年活动的形式，继续进行“民先队”的工作。同时原各单位一些久经考验的符合党员条件的“民先队员”，由省工委批准接收入党，并在各学校、工厂、职工团体分别建立了党支部和党小组。自此，各单位的青年工作，如秘密的“读书会”和公开的歌咏队等，都加强了组织领导，成为各党支部领导下的重要工作了。疏散在外地的各校歌咏队，在各地扩大了工作阵地；留在昆明的云南大学、西南联大分别举办了全校歌咏比赛，又联合组织了“五四纪念歌咏会”。原民先队老队员李仁荪、李良康、方为策等参加了“民众歌咏团”的领导工作，出版了《民众呼声活页歌选》，加强了创作活动。

**联合文化界扩大宣传活动**——云南存在着地方势力与国民党蒋介石中央势力的矛盾。1939年蒋介石中央势力还未能深入云南，昆明还维持着一点民主抗日的气氛，因而一些教授、和文化界，“如青年记者联合会”“昆明业余联谊社”等，公开组成“文化界抗敌协会昆明分会”经常举办时事讲座、记者招待会等活动。如作家茅盾、进步人士王礼锡等来昆都举行过座谈会或报告会；范长江同志来昆时，还介绍过陕北边区情况。“民众歌咏团”这时期也联合“文化界抗敌